



半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合刊

半月刊「和平之謎」(文)	賴樸漢可以休矣(風)
輿論	無政府狀態與饑餓政策(風)
新民主文化建立論	蘇潤雷
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	孟憲章
從東南歐看新民主	余敏燕
民主化教育是個性教育	程仲文
人類學在種族研究上的貢獻	李成蹊
台灣的內在危機(台北通訊)	林伯聰
粵省的軍事新部署(廣州通訊)	巨吼
政院內遷後的廣東(廣州通訊)	巨吼
沉悶中的刺激(南京通訊)	邵竹軒
解放後的天津(天津通訊)	朝生

無政府狀態與饑餓政策

總統府在南京，行政院在廣州，政府的財政金融機關搬到福建，各部會首長，東分西散，七零八落。

李代總統沒有頒佈遷都的命令，立法院沒有討論遷都的問題，只是在孫內閣一紙「緊急疏散」的手令中，把行政院搬走了，國民政府已陷入無政府狀態。

在無政府狀態之下，最悲慘的是全國的公教人員：上海的米價，比「八一九」限價漲了五百倍，而公教人員的底薪，經一折兩扣之後，依然停留在「照十五倍發薪」限度之內。

一個簡任官或者一個大學教授，目前每月收入不到金圓二千元，折合銀幣市價，是大洋一元有零。試問如何可以活下去！

上海市專科以上學校教授聯誼會，為着要活命，一再向政府呼籲調整待遇，政府始終充耳不聞，相應不理。孫科和陳雪屏都飛到廣州上任去了。

在政府的饑餓政策之下，讓全國公教人員自生自滅！在政府的饑餓政策之下，祝袞袞諸公「萬壽無疆」。(風)

「和平之謎」

一向被政府認為匪謀攻勢的和平呼籲，自從蔣總統元且文告發表以後，漸漸的以官方的正式方式上市了。這兒我們必須指出：這一個官辦的和平與真正人民所迫切仰望的和平之間，存在着怎樣的一條鴻溝。因為民間的和平願望，是坦白的，無私的，是以愛惜國力與避免戰禍為目的，而目前官辦的和平運動，却在着另一一些條件，即是設法保留反動的殘餘勢力以及避免所謂戰犯的懲處等等，不幸得很，由於政府過去在民間所散佈的一貫的惡劣印象使得真正老百姓在這時候對於這些條件，反而最易首肯，然而在官方看來，卻正是和戰決策的重要關鍵，輕易放鬆不得，這就卻說明目前官方的和平願望與真正人民的和平願望之間有着怎樣的距離。想起我套一句成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未嘗見不如此，他們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把希望寄向局部的和平上去。所以除非現在官方深切瞭解民意之不可侮，與和平之萬難言，這一矛盾，勢將持續下去，直至民意形成力量，來揭發這一謎底為止。(文)

賴樸漢可以休矣！

本月十日上海新民報一段記載：「孫科內閣，曾要求美國援助，某將軍不久以前會銜命去東京，與在日美方重要人士，有重要會商，聞中國要求之十五億美元貸款，可能實現。其中經濟，農業貸款為五億元，物資及軍需貸款十億元；賴樸漢此次去粵，對於原則上會與中國方面交換意見。」

在平時，有別的国家貸款給中國作建設生產之用，我們自然是歡迎的，可是在目前，我們堅決地反對以美國的貸款，幫助「中國撤亂。」

中國內戰，是咱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毋須別人來管；用美國金錢與軍火來屠殺中國老百姓，更是豈有此理！

況且，中國人民現在所要爭取的是和平，不是戰爭；是生存，不是殘殺。孫內閣以「孫內閣」的姿態登場，曾幾何時，又要求美援來延長內戰了，這是「口是心非」呢？還是「英雄本色」呢？再說，萬一美援拿到了手，結果無非是中飽了少數的豪門政客；軍火拿到了手，也無非是多屠殺一些人民，往事班班可考，國內無人不知。

美國的金錢，還是讓華資街的富人去浪費罷，不許再在中國土地上放火了。賴樸漢可以休矣！(風)

論壇

新民主文化建立論

蘇淵雷

一 引言

文化是價值生活的創造，指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生活之最高的型式，它包括精神活動，物質生產，以及二者關聯與發展的全程。

文化有三性，一體承性、二吸收性、三創造性。繼承是歷史的傳統，吸收是時代的潮流，創造是民族的形式。談文化建設，必須涉及歷史的因緣和現實的條件，不作「華股樓閣彈指即現」之想，亦不願侈談「龍肉」而不得一飽。

我們認為：一個人或一民族，任你怎樣灑脫，自由，總不能不受空間的羈絆和時間的薰陶。人是地之子，多少帶點鄉土的氣息。歷史的傳統與現實的業力像阿爾卑斯山一樣，歷在我們的頂上，我們不能一齊地拋歷史上的材料，而憑空建築自己合意的天堂。不錯，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能恰如其所欲，人類只能在歷史所薰與的條件之下展開自由創造的工作。所以人類文化遺產的繼承，是生物學上自然遺傳的意味，不是社會學上法定繼承的意味。我們即使口頭上聲明，願意放棄這份文化上的私產，但實際上，過去文化的業力，總以種種姿態，在社會心的最深處潛藏著，到處左右我們的行動。在今日，要建立起一種與故舊絕緣的新文化，實在是件不可能的事，而且依照思想之辨證的法則，文化之史的發展律，也斷不容我們對舊文化棄之如敝屣，何況它還是培養新文化燦爛之花的沃土？所以，資本主義的文化，必須植基於封建社會廢墟之上，同樣，社會主義的文化，亦須有高度的資本主義，為其先行的序列。

復次文化吸收性的大小，要看一民族生活力的健康與否以為斷。正當青春生活力旺盛的時候，對於一切外來新奇的文化，最能消受。我國如隋唐時之吸收印度文化，經過相當時期的消化，至宋明而產生純粹的理學。文藝復興後之歐洲亦會播受希臘與希伯來的二大思潮，而造就近代輝煌的文明。日本德川時代之政治，應歸功前期漢唐文化吸收的完美；明治維新後之日趨富強，亦緣盡全力吸收歐美文化的成果。

但一民族之能吸收外來文化，第一，要自己先有相當高度的文化為基礎，然後才能從容吞吐，擇善固執；第二，要有健全的內部機構，從事有計劃的進

行，多方準備；一切保守阻礙的勢力，務當排去，若干轉形期的畸形現象，尤須設法消除然後新型的文化，才有所託足，不敢「渡江變枳」，「遷地勿良」了。文化吸收，不是架空的觀念之聯絡，而是依存於經濟基礎之真實的適應，所以必須產業發達，資本集中，勞資對立，然後真正的共產主義文化。始有孕育滋長之可能。又如，佛教的大量輸入，必在人心厭亂風大扇之後，而周易老莊三玄之盛，正為大乘佛法導夫先路。天台華嚴諸宗的興起，禪宗的創立，都可說是先有老莊之學作底子，加以商業資本主義抬頭，中外交通發展後，人民思想活躍，因之易於接受新文化，而與高度的舊文化水乳相融。當時一般高僧之深通老莊，儒家之好參禪學，三教同源之論，援儒入釋之說，代有所聞，即此歷史的契機。

至於文化創造，正是最高度的綜合。其前提尤賴物質生產力的發達；使人得有閒閒的歲月，作真美善勝境的探求。古希臘黃金期的文化，實由當時奴隸勞動，貴族及自由人得有閒暇，從事文藝的創作與哲學的思索。近來蘇聯三五年計劃的成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猛進，亦正因社會內部無矛盾，人民生活得保障，故人人得於工作之餘，自由活動，一邊學習，一邊創造，取精用宏，左右采獲，文化的發展便一日千里了。

總之，以社會主義為最高指導原理，在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前進的時代思潮下，我們應當兼收並蓄，含英咀華，創造出一種最富歷史性同時又最富時代性的新文化，以為民族生活之最高最善的形式。

沙羅門說：「陽光之下無奇事」，這只道出了真理的一而；生生不已，新新相續，世界雖則老了，還會年青，這就應着席勒所說「世界老去復年青」的一句話了。當此歷史波動時代飛躍之際，我想就新民主文化建立的根本問題，提出些廣泛而扼要的芻蕘。

二 觀念轉變

在一個新的政治制度下，首先，我們應轉變自我生活的觀念。

(一) 從民族獨立到世界大同 我是中國人，我是黃帝的子孫，這是第

國認識；其次生於斯，長於斯，祖宗廬墓所在，衣食起居所賴的祖國，我們應當愛護，象死勿去，這是第二個認識；同時對於同血統，同語言，同生活習慣的組成員，尤應有患難相共，疾病相扶持的同胞之愛，這是第三個認識。以上可說是民族主義的起點。

民族獨立以後，才有資格談世界主義，一切種族的藩籬打破了，資源供給得到合理的分配，人類才能各以兄弟之愛，相見於世界。那時候，我們不僅以「國民」自限，應以近賢所製道的「世界大同」為最後歸宿，或如希臘哲人所自稱的「世界公民」，肩起作為人類一分子的責任，對於全人類的生存，寄與極大的關懷。古人那種「東西南北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見解，真有「世界公民」的風度，而那派開君王行仁政，編編氓以終老的心事，實在是人類理想政治的極致。

所以，從愛祖國到愛人類，從民族獨立到世界大同，從夷夏之防到天下為公，這是有史以來理性發展的最高峯。

(二)從政治約束到個人自由 荀卿有言：「人生而有羣」；亞里斯多德亦謂：「人是政治的動物」。人類自進入社會生活後，勢必受所與團體的約束，因而個人委身於全體，以成就其存在。所以，一個人任你怎樣灑脫，總不能遺世而獨立。莊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正指政治約束的必然性。

在民主政治下，我們雖可得到相當的自由，但不能絕對的自由，因為個人自由常寓於團體自由之中，國家或社會為個及大多數的最大利益起見，對於個人的自由，不能不有所限制和干涉。首先，我們應認定自己的身分是「國民」，對於國家意志——政府法令，有接受並服從的義務。但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我們的自由不應輕易放棄。依照黑智兒的說法，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同時寄託於法律；不是一個人的自由自在，勢須受制於周圍的條件。柳子厚詩：「春風無限澤潤意，欲採掇花不自由」，正是說明此意。所以儘管無君無政府的思想，自莊子至樂論「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以至王荆公桃源圖詩：「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歷史上不絕記載，但真正無治的理想，迄難實現。必須經由徹底民主政治實施後，每個人人格平等，意志自由，政府既失其干涉的作用。人民復能塊然相處於法律之中，互相尊重互相禮讓，則真正的自由生活，有似「天民」者，或可實現；但在擾亂之世，小康未濟，那種遙遠的理想，怕不是一蹴可幾的。

(三)從勞役到服務 人道始於衣食，而勞動為其手段，因此人類進入社

會的生產過程，發生種種人我相互的關係。古稱「民生在勤」，歌德說「太初有業」，陶潛詩「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都是說明勞動為生活的本質。

自私有財產發生後，勞動成為資本累積唯一的源泉，而人剝削人的制度出現；勞動遂被視為可詛咒的苦役，因為它已沒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氣概，而僅為米鹽瑣屑驅我的手段；如種花翁不為欣賞而種花，垂輪曳不為消閒而垂釣，乃至工人不為自己需要而製衣造屋，其結果，勞動不是生活的本身而僅為生活的手段，這中間不知有多少悲劇多少萬藤產生？資本家專以剝削他人勞動的價值，為自己致富的源泉，因此形成貧富的不均，階級的對立，近代社會革命，民生問題，都從此發生。

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下，人剝削人的現象，逐漸消滅，勞動已不是一己謀生的手段，而是為大多數人謀幸福，已沒有「生活難」，「世界苦」的壓迫，而饒有征服自然開物成務的樂觀態度。孫中山先生所暗示「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正是勞動服務的真諦。到那時，才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類的新史道才展開，生活的真義這才味得，理想國，烏托邦，華嚴樓閣，地上樂園，都一一實現了。

所以，從勞役到服務，從剝削到共享，從生活手段到生活本身：這正是合理的經濟體系下人類勞動觀念最大的轉變。

以上三者是觀念的革命，亦可說是新民主文化的基調。

三 學術判攝

莛草體大，非一人一手之烈，所可奏效，亦非樛樛影響之談，所可濟事。有關國故揚棄新知介紹諸問題。必須疏通通達，切問近思，刊立大本以為天下式，然後理論有所依歸，推行不致受阻，自然水到渠成，不覺十分費力了。早歲造「文化綜合論」，對此略有主張，本詳略互見之例，這裏可提出的，僅是些綱領的綱領。

(一)啓蒙運動的展開 我國的啓蒙期，可說從鴉片戰役五口通商後開始。中經魏源、關自珍的今文經世之學，曾子的洋務運動，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康梁的變法，辛亥的革命，民八的五四運動，北伐的文化批判，乃至最近的「學術中國化」諸運動，都是一脈相承的發展，迄今未見其止。

世界上，國民啓蒙運動做得最好的。要算法蘭西大革命前的百科辭書派，像服爾太第特洛等偉大的思想家，號稱知更之鳥，獨開風氣之先，將當時所

有進步的學術思想，都納入百科大辭書中，以為國民教養的基本讀物，造成不少革命的幹部和時代的兒女。其次，日本明治維新前，許多學者一方消受漢學的精華，同時吸納歐洲的新學，除努力介紹工作外，還以日本通史智識，灌輸到一般國民，使得有歷史的覺醒與時代的認識，如德川家國等所著的「大日本史」，專提倡尊皇忠愛的思想，所以維新的收效，來得迅速。

我國古代，自孔子以六藝教人，學術平民化後，一時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夫子，漢代尚立五經十四博士，以樹學術的權威。近來我國雖有中央研究院和國立編譯館的創設，大抵限於「引得」和「校訂」的工作，除自然科學部門略有表現外，尚鮮顯著的成績，如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學士會那樣有聲光。鄭意政府無論在任何困難情形下，首應籌畫的款，網羅鴻碩，設立全國性研究最高機構，略仿宋明帝之分文體文史，先設哲學、文學、史學、史學、編譯四館，將原有的中央研究院，專闢為自然科學研究機關，其餘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可分別併入文學史學二館內，同時特聘巍然獨存的老師項為名譽館長，因古有往學而無來教，所以要尊之以禮。（至其過去政治立場，可不必追究，一如辛亥革命後北大之善遇到中叔章鴻鈞近代史家之不廢羅振玉王靜安）另以現任大學院系主任學識淹通者，充任館長及各組主任，負責實際指導之責，然後廣延研究員，招收研究生，在教學相長師弟合作的空氣下，學術的新氣象可開，新學派亦可自由成立了。

年來國家多故，文獻不足，一時最為老師者已罕如星鳳，太炎、任公、伯嚴、靜安、孟敏、竟無諸公柱矣，現仍健存者，若馬一浮之理學，呂秋逸之佛學，陳寅恪之史學，章行嚴之名理，陳著虬之詞章，亦並世絕等雙者。外此若梁漱溟、張東蓀、謝元量、郭沫若諸氏對於中國文化之一般理解與考信，雖親疏有別，得失互見，要皆足自委其意，成一家言。假能廣為羅致，聽其自開講席，各立門庭，則於學術思想的發展，當有可觀的成績。而目前最重要的文化工作，無過編纂新百科大辭書及中國通史二事。

百科大辭書應以大英百科全書及蘇聯百科辭書為藍本，益以我國的古今圖書集成等類書，融會貫通，鑄鑄新型，以為學術的總匯，文苑的珠林，（中國學典館楊家駱氏一部分工作，與此極相近，彌足欽賞）至佛藏之精刻，尤為歐陽寬老居士晚年的弘願，惜未完成。蓋以歷代帝王於得天下後，皆刻藏以示邁向。日本於日俄戰役後，亦誓刻藏經，附死釋將士之名於後，以慰忠魂，中國抗戰建國，視舊日之得天下者，與嗜戰之日本，其意義的重大與深長，不可以道里計，刻藏以為時代的紀念碑，實不容緩。况以最精美最完備之佛藏，貢

獻於全世界，亦我國文化獨立的工作，不可謂非一大事因緣了。

通史的編纂亦應分國民通俗本與足本兩種，先請專家分別主編，另由兼具史才史學史識者總其成。總之，這兩種書須集四館以及全國的人才物力，日積月累而成就之。十年以內，我們如能編出這兩種書，作為改造國民生活的精神食糧，以提高其民族性與時代認識，我想其功效當不在法國革命時大百科辭書和日本維新前國民通史二書之下了。

(二)世界學術中國化 學貴求是，本無中外之分；但在我國學術獨立發展和近代科學落後歐洲百餘年兩特殊情形下，首先，我們須將世界學術作有系統有抉擇的輸入，然後再將消化已久的我國學術吹入生氣，重加揚棄，以與世界進步的學術相配合，執兩用中，以求至善。以上專就文學、哲學、政治、經濟等部門而言，若自然科學，只有精粗之別，決無中外可分，所以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在世界學術市場上貢獻能力，發展天才，（在這一方面，若翁文灝李四光之地質，姜立夫，蘇步青，華羅庚之於數學，都已有國際的聲譽）共謀人類智慧的進步。

歷史上，學術中國化工作做得最好的，要算隋唐間的佛學者，若天台華嚴諸宗，要義雖本於經，其輝煌的理論體系，實是中國化後佛學的新展開；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雖託為達摩初祖，却正是中國的本地風光，中國人自己的開宗立派。近代若嚴幾道之譯西書，已漸知與我國學術相比較，其譯本後每多按語，頗能抉西學的精微，會華方的勝義，遠非西學古微派之附會穿鑿者所可比擬，至章太炎王靜安等因研究西洋哲學文學，而對中國哲學文學所發的議論，便不同凡響。章鴻銘，蘇子毅等之互譯中西文學，亦每每得妙處，林長蘆雖不識西文，所譯都出第二手，然其所闡文境文心，已開馬班以後未見之局面。而為後來的新文學運動，作精神的響應。這些東鑄西瓜，雖不是系統化的學術工作，但已為我們留下了可珍貴的例子。

此外，大學教科書尤須自編適合國情的善本，脫離舶來的依存性，例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文學史，哲學史等書，總以中國人自己著成的為佳。蓋歐美學者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自黑智兒以至章爾斯，都不免有隔靴之感。他們研究的對象，往往限於歐洲社會，當年郭沫若曾致愷於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雖稱精審，但對於偌大的東方社會，未有一言相及，於是發憤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以填此空白的一頁，所論雖間有未盡，尚有一派大家氣象，要為難能可貴。

近今學者，往往守一先生之言，自限自封，遊學歸來，未能收一隅而知

其類，異而知其通」之效，為祖國立學術高深之基礎，以提倡國際的地位，博士以成鈔書，求學等諸販賣，亦可算虛出國門了。所以如何系統的翻譯世界名著，介紹新興學術，同時從事國故揚棄的工作，而建立自己學術的新體系，使世界學術中國化中國學術世界化，實為當務之急。

(三) 民族形式現代化 就創作的形式，推而至一切生活的藝術言，每一民族各有其特殊的作風，為其歷史所鑒定，而垂為典型。我國的民族形式，隨手拈來，如詩中之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前三指內容後三指形式），畫中之有六法（尤重氣韻生動），樂中之有雅亂（所謂曲終奏雅，頗近樂旨之複述，雖歸亦有亂曰以為結束），戲劇中之重象徵的手勢，歌舞口白之同時並作，大羅大鼓急管繁絃之交響，都不失為優美的民族形式之一。至中國子因富有線條之美，所以超之讓用隸法畫梅，吳昌碩用篆法寫竹，復因富有印象之美，所以詩畫互通，中國畫家慣以題詩補畫境的不足，或化詩情為畫境，以寄遙深的感興。蘇東坡稱王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實為知言。中國山水分金碧與淡墨二派，花卉分勾勒與沒骨二派，至宋又有文人畫出現，蘇米好寫寒林竹石，以意境為尚，自別於古典的院派，而南宋山水，其影響且遠及荷蘭的風景畫與印象派之創作。文章風格，漢魏古賦，六朝美文可勿論，即韓柳歐蘇歸方的散文小品，其波瀾壯闊，明細靈秀之處，視西洋有名之 *English* 與 *Shakespeare*，殆無遜色。章句組織之美，抑揚明默之調，即英倫文家自麥考萊以迄却斯脫頓的小品，不論內容論其法式，恐亦未必勝此。近人習為語體文，若不深味駢散文的氣韻體勢，以自錘鍊，欲求文美難矣。（魯迅小品的遒勁，半亦得力於漢字訣）。

如何將這些固有文藝的形式現代化，使成為表現新時代生活的最佳方式，全仗各部門藝術家的更大努力。關於中西畫法的融貫，現實題材的攝取，如高劍天、徐悲鴻、傅抱石超雲雲等，都有較好的成績；而版畫不刻的提倡，民間游藝的採用，以及舊劇的改良，亦日在有素養的藝人的試驗中，這只可說是開端。

造型藝術方面，隋唐間佛像的雕塑，原帶有印度的色彩，而塔與闌若的建築，對於營造法式上影響更大。我國所擅長的，則為造橋造城之合於重學原理，闌亭花石之富有詩意，又如昭陵八駿，孝陵石獸，都散在廣漠的邱陵中，形成偉大平遠的墳園組織，那種泱泱大國之風，視古羅馬之「大」，實有過之無不及。音樂歌舞方面，錢智閣中原雅樂亡後，自西域輸入胡樂，一時稱盛，琵琶羌笛羯鼓絃索等，已成為流行的樂器；而蠻歌，蠻舞，蠻調，也就源源輸入，迄乎今日，已成為民族形式之一。今日古樂留存的，恐怕只有祭孔時那一派鐘鼓鐃磬之音了。（瀨陽孔廟留傳一脈）

至一般的生活方式，若國棋柔術之有登身心，易卜相人之足以觀變，亦不失為可存者。周代士必習御，無故不去琴瑟；兩宋以前，儒者佩劍，文官騎馬，上流女子皆富體操於鞦韆，均為民族形式之已亡者，現在亦有設法恢復並使之現代化的必要。總之，無論藝術的創作形式，或一切生活的藝術，不問固有或外來，凡足以提高興趣、洗鍊感情，並發揚我們生活向上的精神者，我們都要好好的保留他，改造他做到「恰到好處」，「漸近自然」的程度。

近人對於民族形式，漸加注意，惜討論範圍僅限於文藝，而偏談原則，未能鞭辟向裏，為可憐耳。（上來所說，不過一二例證，其詳當非茲篇所能盡）

四 生活改造

世界上諸民族的文化，其形式雖各有特異，文野亦程度有差，但就其本質說，不外商業文化和農業文化兩種。「有無相通，供求相應」，是商業生活的一種基調，「自給自足無求於人」，是農業生活的一種基調，兩種生活的基調既根本不同，所以影響到思想，習慣制度上，處處形成對立的狀態，但其間並不永遠衝突，有時激盪有時調和，可能轉成另一種新型的文化。

就大體說，中國為農業文化，歐美為商業文化。分而論之，則中國春秋前為純農業時代，戰國末劫，貨幣出現，都市發展，漸有商業文化的色彩；至漢賤商重農，以孝悌力田為致治之本；唐因通中央亞細亞及南海，而商業文化又盛，元明後西域大道阻絕，商業停滯，仍以農業文化為主；鴉片戰役後海禁大開，資本主義侵入，而社會遂驟向商業化邁進。

其在歐洲，希臘以海國興，為商業文化的雛型。但其時雅典商賈，斯巴達重農，已有分別。羅馬以一半島而發展，繼承希臘文明而調和農商，靠海上的財源文化以發達大陸；至中世紀封建時代，因重農業，商業就退化了，由十字軍的東征，引起文藝復興，於是又從農業文化轉到商業文化；接着發現新大陸，發明蒸氣機關，而資本主義就如日方中，直到現代，都是商業文化的時代。第一次歐洲大戰後，各國漸講自足自給，農業文化又有抬頭傾向，而蘇聯的鄉村電氣化計劃，逐漸實現，新農業文化又出現了。

所謂工業文化，不過商業文化的高級形態，本質上仍是商人的，工業須原料，農業須機器，二者互相補充，互相依賴，未可截然分別。此二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到意識形態上，可說商業生活重自由發展，農業生活重服從權威

，一個於肉，一個於靈。西洋之有古典派與浪漫派，中國之有儒家與道家，正可說明農業文化與商業文化的分野。古人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可以說齊代表商業文化，魯代表農業文化，而所謂道者，殆指調和農商二者的新型文化觀！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無疑的是要從上述商業和農業兩大文化系統中，取長捨短得最高最大的調和。因之我們生活的改造，須從二者交流處着手。

(一) 都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之調和 近代都市繁榮的結果，使人類生活日趨複雜化，競爭化；減少隣人之愛，更無閑暇之情；利己之享受主義，投機的交易所心理，拜金的狂熱，交織成不可諱的現代文化的罪惡。使人與人間，人與自然的距離，日益遼遠。一種溫暖的同情之愛，常為詭譎的拜物教所替代，勞動者在不休傳達帶下，幾無喘息的自由。希臘大儒學派中有以一桶自隨，白晝舉火在雅典街上找「人」的，可見都市生活久已使人失「真」了。唯美派詩人王爾德曾在倫敦街上穿奇裝，佩向日葵，高視闊步以自恣；惡魔派詩人波特萊爾至吸鴉片，詠死屍及貓頭鷹以自道，足見他們對現代都市之「美」的厭倦心理，一切靡靡盜盜的新聞之聲，低級趣味的普通深入人心在表示現代都市生活中，更無善與道德之可言了。

但都市生活亦有好處：生命的錯綜之網，絲絲入扣，個人不能自外；易於接受新思想，工場和劇場亦可陶鑄新人物。職業自由，不受土地或家族的拘束，朋友同志，易起共感；這兒沒有傳統，只有新鮮。

鄉村則反是：一種靜穆的牧歌式生活像一首田園詩，四時景物寫就絕妙的好詞，只要你一抬頭一舉足，種種境界一齊向你奔來。人與人間，人與自然間只覺得親切有味，絕少尼采所說「距離的悲哀」。出入相與，鷄犬之聲相聞；沒有色彩的饑荒，沒有市聲的轟鬧。一切的塵寰，一切的非行，都無足礙藏身的地方。這兒沒有燈紅酒綠管絃的場面，只有一塞雅雅點點流水繞村，缺乏青春的動力和活躍的精神，易趨平淡，平凡，絕少都市生活那種絢爛奇異的聲光，更沒有如茶如火軍樂運動的熱情。

總之，都市生活重外的發展和官能的享受，鄉村生活重內的約束和自我的吟味。前者不免鈎搭外界，遂物而喪己；後者只是執著小我而忘却大眾。所以要調和二者的生活，先須在物質上做到農村電氣化，都市田園化，然後去其機心，發展個性，喚起連帶責任的感覺，不礙獨往獨來的自由；不為稻粱謀而各就自己愛好的職業；不因人熱而自立門庭。這才是生活的最高形式和最大意義。

，為我們所當努力以赴的理想境界。

(二) 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之調和 私生活與公生活的矛盾，家庭幸福與社會活動的不一致，這些都可說本質上是商業和農業的生活基調之不同。古稱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人道的起源。我曾說人生最難處的境界有二：一是男女之際，一是功名之際。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恆」；又說：「物不可以終久，故受之以遯」。到底夫婦之道可以久不可久？是否將另有所遷？這實與飲食同為絕大的社會問題。戀愛的因素，往往出於物觀之外，純粹經濟關係的說明，有時亦窮。再說，

「夫妻反目」，首見易經；怨女曠男，可說治亂。古有棄婦之詞，近傳獨容之曲，或倚柱以悲吟，或白頭而興怨，這些都是屬於女子的悲哀；至古樂府有「雉朝飛」，張籍有「節婦吟」；劉孝標汪容甫的白文，那種掩抑的情緒，滿紙的牢騷，還不是「非偶」一因素在作祟，而歷代詩人綺懷詩之多，正可說明中國婚姻制度的缺憾。照佛羅乙德精神分析學的法說，一切變態心理與夢，都是男女因慾望受抑而起的作用，全由「力必多」(Libido)而起。恩格斯說過，資本主義社會根本沒有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存在，除非以通姦或宿妓來補充。這話雖刻，殆亦實情。不過，在我國農業化的社會下，男女雖不安於室，受著舊教條的束縛多不敢輕易提出離婚。而在歐美商業化的社會，以及我國各大都市裏的男女，就不同了，朝秦暮楚，不足為奇。生離死別，其中含有多少難言之情？這是人世間最悽慘的事，決不可僅供為茶餘酒後的談資，以上還不過就男女本身的配合不當說。

至因男女之際而牽及功名之際，換言之，因家庭生活而引起社會生活的說節者，其間葛藤，尤非一言可了。近人對劉申叔的學術雖無間然，而對其志節，頗有微詞者正因他於男女之際與功名之際，未得合理解決的緣故。古人對此問題解答得最灑脫的，要算范蠡，我曾寫過一首詩，自謂頗能道出他的心事：「絕世風流范大夫，竟憑一女沼全吳，想當初情動洗紗際，未必成功不自居」。正可移此說明。

復次，我國因為是大家庭制，仰事俯畜，一個人往往負有較多的責任，米鹽經濟很容易阻礙他社會生活的發展。白居易有過兩句詩「僮僕數歡妻子笑，算來只是為他人」，這對生命力較旺，社會感較敏的人，真是一種苦惱。(反之對於幽居家庭的娜拉，其痛苦亦同復相同)至於那些實線牽引，以多金高位為倚，歸駝妾婦的，又當別論了。

必須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下，男女生活獨立，職業自由，社會復有託兒

慈幼等組織，那末男女的幸福，或可獲得。那時家庭已經變質，不復似往昔的極情愛情；同時家庭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不復獨立，致限制男女社會活動的自由。這時候男女經濟已獨立，智識又發展，彼此諒解既深，互相敬愛，那末他們正處愛愛所謂「人格之合抱」的生活，縱有此難，亦不多了。

一個人既享有愛的生活，即使在社會活動上有時失敗，亦可因愛力的激勵而重振奮鬥的勇氣。記得歐文寫過一篇小品，喻人之未有愛的生活，其心靈的空虛，一如荒屋之無人居住；若得愛侶，則他的生命將如長春藤的滿含希望了。要把那種冷酷的乏味的家庭生活，設法改變他，使成為溫暖的，自由而不自私的家庭生活，同時更可促進一個人對社會事業的熱忱，這正是民主革命完成後我們更要致力的「第四革命」呵！

(三) 感覺生活與價值生活的調和 觸受的快樂是感覺的生活，體味的快樂才是價值的生活。淺言之，「溫飽」是感覺的生活，「心安理得」，則是價值生活了。感覺生活為物界所同具，價值生活則為人類所獨有，其間亦有等差。論者稱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利是感覺的尺度，義是價值的尺度推而至於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寧孔顏樂處，志伊呂之志，都可說是價值生活的極致。人類一切藝術的創作，學問的研探，自然的欣賞，真如的證悟，凡是不以官能刺激，利那享受為滿足者，都是價值的創造，意義的追求，所謂文化生活也者，才得託足之所。

近代哲學漸趨價值論，自尼采以下，皆以人類生活的向上與提高，作為中心的教義。所謂「昇華作用」，「柏拉圖式之愛」，「真美善」，「智仁勇」，無非價值生活的別名。正如精神不能離開身體一樣，價值生活亦決不能離開感覺生活而獨立。須得於現實中求理想，於現象中求本體。所以「身處江湖之

上，心懸魏闕之下」；「晤對一室之內，放浪形骸之外」。要有關心落葉，寄語夕陽，惜花起早，愛月眠遲的偉大同情心。要懂得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的法門，要解得無明有愛是如來種，生生愛息是天地心，這樣，才能使生活意義增強，人生價值提高；到此，功名榮辱的念頭，完全泯滅，天光雲影，自然披霧，愛染無着，動靜無違了。

古今來的大思想家、大詩人、大情人沒有不懂得感覺生活與價值生活之調和的。子見南子，莊周夢蝶，伯牙絕弦，陶潛乞食，謝安的東山絲竹，胡叟的歸對梨渦，乃至韓愈的縱博，歐陽修的治詞，抗世駿的「買賣破銅爛鐵」，都是絕好的例子，國外的如柏拉圖的對話，伊索普的寓言，但丁的神遊地獄，拜倫之異域從軍，以及蕭伯納之與女僕談愛，張伯倫與哈里斯軍書旁午時在下院開談釣術，要都懂得生活本身的價值。再說，鄉下老太婆聽書掉淚，為古人擔憂，市井好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歲時伏臘，斗酒自勞的村翁，驢鏡興學，長跪不起的義丐，亦是深通價值哲學的典型人物。

總之，價值生活與感覺生活的調和，實是人生最高的理想，直達「無關心」與「忘我」的境界。往會作一偈：「物心雙遣無入我，客賊並來有主賓，能得書山獨往意，何妨步步踏紅塵」。正可移作此節的註脚。

上來所說文化創造三大端，僅是些原則的原則，讀者或許以為迂闊，視同河漢，實則繼往開來，安心立命，固應如是。「大道不肖」，我將以此解嘲了。

附識：此文章創於三十年，迄今，式發表機會，時事推移世變昭矣，今日出此，猶恐不盡為世人所了解，乃知一鍾以二伍惑，古人之歎為不虛也。

三十八年一月廿日

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

孟憲章

一 經濟是社會的下層基石

經濟是社會的下層基石，而政治與意識形態，僅不過為其上層建築。作為下層基石的經濟制度或生產關係，一旦發生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制

度與文學、藝術、道德、宗教等，也或急或緩的隨着發生變革。封建社會的經濟，是區域性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封建地主對農奴的剝削。故在政治制度上，只能產生封建專制君主；在意識形態上，多富有狹隘、保守、樸素等色彩。資本主義社會

的經濟，是世界性的大規模的工商業經濟，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故在政治制度上，產生近代資產階級專政的虛偽的民主政治；在意識形態上，雖具有世界性，前進性，但卻帶有極濃厚的貴族色彩。及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其經濟制度，是建立在無

到無階層，與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大前提上。故其政治制度，才能產生真正平等的民主政治；其文學藝術等，才能真正為一般勞動大眾所平等享受，而帶有普羅色彩。

又如在現在國際關係中之帝國主義國家無不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國。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又無一不是落後的農業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度階段的產物。只要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性的，發展到壟斷獨佔階段的時，對外一定要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對內一定要走上法西斯的道路，美國就是一個顯例。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仍停滯在落後的農業階段，那麼，縱然由於國際環境的有利條件，俾得列於四強，五強之林，或獲得表面上的政治「獨立」或「自治」，但實際上在經濟上，仍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前者為中國，後者為「獨立」後之緬甸、菲律賓，與「自治」後之印度是。根據上述諸例證，我們深切知道「經濟決定一切」，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當然不應該抹煞人類主觀創造力量，或為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或經濟主義者）。

二 經濟發展的規律性

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有其一定的規律性。即從原始公社社會，經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無論東洋或西洋國家，無論黃種或白種黑種，都不約而同的順着這個次序發展。倒退固不行，跳越亦不可。不過因為客觀上地理環境之差異，與主觀上人類努力之不同，其發展有或急或緩之區別罷了。就中國說。當三千年前，我們已進上了封建社會，彼時歐洲諸民族，多數尚在奴隸社會，有的還未脫離原始社會。現

在人家已一般都發展到資本主義，有的已進到社會主義，我們廣大區域，依然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狀態中。

人類為求生存，不能不生產。生產包括下列兩方面：（一）生產力，包括人類努力、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土地原料）等。這是人對物的關係，是技術性的。（二）生產關係亦即財產關係。這是人對人的關係，是社會性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主要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不斷展開。當新的生產力首先是新的生產工具發展時，舊的不合理的生產關係，已成為新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新生產力突破這種舊生產關係起見，便發生鬥爭，這就叫做革命。一旦把舊生產關係突破，另行建立一種新生產關係，新生產力遂得呈現突飛猛進的發展。及生產力再進一步發展時，遂另要求更新的生產關係。似此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不斷的展開，遂將社會制度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

當原始人類僅能運用石器作工具時，只能發生一個人勉強養活一個人的採集經濟，與漁獵經濟。因之，當時的社會，是無階層，無剝削的原始公社制。及銅器時代，生產力較強，進到畜牧經濟，遂有剩餘價值的產生。於是從前把俘虜殺死者，現則留之為奴隸，從事生產，遂進一步到有階層的奴隸社會。到了鐵器時代，生產力更強，又進到農業經濟，而以地主奴役農奴為主要剝削形式的封建社會，於以出現。趕到蒸汽機發明後，生產力愈益增強，再進到大工業經濟與以全世界為範圍的商業經濟，遂又產生以資本家奴役勞工為主要剝削形式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大資本家將過去極端散漫的農民與小手工業者，成千累萬的集合於少數大工廠，使生產社會化。而自己却作一個寄生坐食階級。此種生

產社會化與佔有私人化的矛盾，不斷展開，遂使資本主義制度最後不能不讓位於社會主義制度，為嶄新的生產力，開闢一無限發展的前途。使人類社會仍走進到無階層、無剝削的真正平等社會。

三 現世界四種主要經濟體系

系

分析現在世界各民族經濟結構，實極龐雜之大觀。在非洲及太平洋孤島中，仍有經營原始生活的食人野蠻民族。即在中國西南民族中，亦有未脫離奴隸社會者。不過大體言之，却以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三者，佔絕對優勢。再詳細言之，約可分為下列四大類：

（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屬此類國家，皆有高度發展的工商業。有的尚停留在資本主義初期，以輸出商品為主，如北歐之芬蘭、瑞典、挪威、丹麥、西南歐之西班牙、葡萄牙、與中歐之瑞士等。有的則已進入以輸出資本為特色，並在國外擁有大批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階段。如英、美、法、荷、比、與新近戰敗之日、德、意等。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垮的三國固不必說，即英法荷比等國，也都貧困化。惟獨美國獨佔資本，因發了一筆戰爭財形成暴富，成了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座堅強的堡壘。

（乙）封建的殖民地的與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體系——屬此類國家，有整個的中南美，整個非洲以及絕大部分的亞洲國家。其生產仍以落後的農牧林漁等經濟佔絕對優勢，技術水準亦甚幼稚。帝國主義國家，則因投資關係，操縱其金融、交通、大企業與對外貿易的命脈。

（丙）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體系——屬此類國家

有中東歐的波、捷、南、保、匈、羅、阿、等七國，亞洲北朝鮮與外蒙，亦屬之。戰前原皆屬於乙體系國家，現則正同時進行着或已完成了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工作，並運用各民主黨派所建立的民主政權，實施土地改革，完成大企業國有化，進行計劃經濟，使整個經濟迅速建立更高的現代水準上，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為過渡，消極的揚棄以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為過渡，積極的孕育和滋長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以最後走進社會主義。

(丁)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此類國家現只有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經過最初三年為應付內戰及反帝干涉的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七年新經濟政策時期與戰前兩個五年計劃，已經獲得

從東南歐看「新民主」

本文作者余先生對於新民主的分析與看法，甚為精當，但是建國的領導權如果是屬於社會主義政黨的話，二次革命應該是可以避免的。余先生以為然否？

——編者——

「每一次現代戰爭，不可避免地給歐洲帶來革命。……這一次，從歐洲大陸來看，它正從自由主義變為一種以社會主義為主的新制度」（前捷克總統貝奈斯語）。戰爭帶給人類以苦難，只有像美國那樣，獨佔資本佔着絕對優勢的國度，才會從戰爭的血腥裏撈取超額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戰，固然打垮了德國，也拖垮了英國，更摧毀了整個的歐洲。戰爭結束後，全歐一片瘡痍，却帶來了一股變化的潮流，北起波羅的海，南起巴爾幹半島的北端，東至黑海，西達德奧邊境，包括了多瑙河流域和奧得

輝煌成果的社會主義經濟。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權已經消滅，人剝削人的物質基礎已不存在，全民正遵照「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與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偉大原則，在全面計劃經濟指導下，從事國家的工業化與農業的集體化。不幸竟遭遇到德國法西斯野獸的野蠻侵略，致受重大破壞。從一九四六年起，又開始了第四個五年計劃。因蘇聯勤勞人民的努力，剛到三年創傷漸復，有某些部門生產，已經超過戰前了。

四 發展的動向

我們觀察一切現象，都要從動的觀點出發。我們分析世界當前經濟結構，亦不可陷入橫斷面的靜

河的主要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再加上阿爾巴尼亞等七個國家。這就是所謂「東歐」。全東歐領土面積共計一，〇八七，五五八平方公里，人口八六，二二三，六九九人。就在這約當於西歐的領土上，首先在戰後世界走上了變的途程。它揚棄了舊的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澈底地推毀了舊有的生產關係，解放並激揚了新的生產力。東歐在人類歷史的行程上，開啓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的歷史內容，就是貝奈斯所說的「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這個名辭，或稱「新型的民主」，張東蓀先生謂是俄國學者E.瓦爾加氏所用的（見增產與革命一文，中建三卷四期），該文會轉載（觀察四卷廿三期），但前面所引捷克總統貝奈斯就

態分析，而應把握到那是沒落的，那是新生的成分，才能看全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就表面看，資本主義與封建殖民地經濟，在現世界的數量對比上，仍佔優勢。但在質量上說，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却以一日千里的雄姿向前邁進。如資本主義各國的蓬勃增長的勞工運動，如東南亞各國的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將世界整個經濟體系，向新的方向推動的主導力量。歷史的發展，經濟的轉化，都有它一定的規律性的。認識了它的規律性，再證以三十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實例，使我們深信國父所昭示我們的大同世界，不久便可到來。（在中國新專稿）

余敏熹

曾經用過。而新民主主義在中國歷史，遠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被正式地提出了的。這且不去管它，總之，在這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事實的證明，新民主主義已經成為一切落後國家革命的總路綫了。要正確地了解新民主主義國家，不獨要懂得社會發展法則之一般安富性，而且要懂得社會發展之特殊的法則性。固然我們應該從其人類歷史進程的總趨向上去認識，但也要從其特殊的歷史前提上來觀察。所以說「如果只知道一切生產方法所共通的商品流通抽象的諸範疇，則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些生產方法的種差。」（資本論第一卷）可見每一社會，甚至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歷史法則存在。如果了解這點，則當我們分析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形式的時候，為什麼獨南斯拉夫具有類似蘇維埃的

憲法，就是一件費解的事了。所以科學的史的唯物論的把握，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了解，是一件頂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們要問新民主主義的含義是甚麼，它在社會經濟形態上具備着怎樣的性質。

「從社會經濟結構看」，新民主主義國家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變態」，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化身」，更不能說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它代表一種過渡的社會形態，具有特定的歷史內容。（陶著新民主主義論，一〇頁）

從社會發展的序列上來考察，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在卡爾的歷史時期劃分內是找不着的。但卡爾所提供的社會發展法則對新民主主義的解釋，却是有着一般的妥當性。因為新民主主義在人類歷史的行程上，完全是嶄新的東西。它正同資產階級社會的未來行程一樣指向着同一的目標。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地說，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平行體系。因為在社會發展一般的合法性上，兩者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前一階段，而在其特殊的歷史前提下，新民主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大大地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

一切走着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國家，其現實的歷史背景，是社會發展停滯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其時間內封建地主與官僚買辦集團，勾結國際帝國主義掌握着實際政權。一切反人民的措施在在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依歸，剝削關係廣度與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對建與清算官僚資本遂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革命是一個突變的過程，它的發生，要從社會發展之內容與形式的矛盾上去理解。每一次革命的成功，都是意味着舊的生產關係的拋棄與新的更高层次的生產關係的建立。在新民主主義所建立的新的生產關係里，雖

然有着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但它却没有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之間的矛盾，相反的，由於反帝，反對封建的歷史使命，在每個新民主主義國家都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必要，澈底的土地改革與國有化政策，會積極地加強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因此新的生產關係具有一定新的運動形式。一切的矛盾會在社會主義成份的加強下緩和了。這是很明白的，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平行體系，但在生產方法的差別性上，却只是一定的歷史階段的過渡形態。

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一切落後的封建的半殖民地國家來說，乃是一條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路徑。

革命的步驟，是受制於現實的客觀條件，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封建性與半殖民地性，也就規定了這些國家社會革命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基本政權形式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反帝反對封建的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權，而這種政權也只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過渡，它是過渡到第二階段革命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國家形式。等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反對封建的勝利完成，才是第二階段革命時期到來，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我們說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階段，一定要將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平行體系，不然我們會很容易犯上左傾空談主義的毛病的。將兩次革命的歷史任務給以混淆，不獨會認為社會革命有着「和平轉變」的可能，更會用「不合國情」的理由而否定了馬克斯主義。如果要將這個階段的革命用「一次革命」來完成這是從未分析一國社會性質的空想。它已由事實證明此路不通了。在一切落後的國家，不從根本上清算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勢力，新的生產關係就無從產生，而生產力的發展仍然受着桎梏。

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權之所以是民主聯合政權，是與

新民主主義兩個階段互相配合的。反帝反對封建的歷史任務必須是全面的，澈底的而廣大人民羣衆的蘇醒，對於這一工作的推進與完成，乃是唯一的保證。因此，各階級，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小市民，民族資本家，甚至進步的富農的大聯合，才是新民主政權的堅固基礎。在這各階層的大聯合裏，無疑義的，是以無產階級來作領導的。但這不是上帝賦予無產階級以這種特權，而是在進行革命鬥爭的進程中，由於理論和實踐上重要問題的正確路線，使它從艱苦的奮鬥中形成了它的領導。試看東歐六國代表在華沙會議裏，關於無產階級黨怎樣在法西斯統治下進行反抗，怎樣組織羣衆，怎樣在國內進行階級鬥爭的描述（見「論新民主主義」〈生活叢書〉），就足以證明了。因此，新民主政權必須建築在社會各階層各黨派的聯合上，而議會制度又是最好的聯合形式。

在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中，其民主政權正是建築在各黨派的聯合上的。而議會選舉在各該國的民主發展上，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波蘭民主陣營的主要骨幹，是四個民主政黨的集團：波蘭工人黨，波蘭社會黨，農民和民主黨，也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波蘭法制會議四四四席代表當選中，民主政黨集團獲得三三四席，佔全部選票百分之八十點一，宣佈擁護民主團結綱領的勞動黨得十七席，波蘭農民解放黨佔十二席。反對黨的波蘭農民黨及其他人士，共只佔卅一席。波蘭法制會議的選舉，結束了波蘭臨時政府時期。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由會議選出貝魯特為共和國總統，組成了新政府。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陣線的政黨共有八個，其中四個是捷克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人民社會黨，人民黨。斯洛伐克的共產黨，民主黨，勞動黨和自由黨。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六日國民法制會議的選舉，證實

了人民陣綫在國內經濟復興上所採取的正確路線，這次選舉，不獨降低了選舉人的年齡，而財產限制被廢除了。在全部選舉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擁護人民陣綫各政黨的，共產黨在三百個議席中佔了一六一四席，獲得全部百分之三十八的選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共產黨領袖高德華組織政府，其中共產黨員九名。羅馬尼亞的人民陣綫有共產黨、社會民主黨這兩大工人政黨，其他有農民陣綫、柴郎黨，自由黨，民族人民黨。民主政黨集團，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選舉裏獲得全部投票百分之七十二。佔全部議席三六七席。羅馬尼亞在各新民主國家中，最後廢除了君主政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卅日，哥根曹勒恩王朝宣佈崩潰，米契爾王在廢除帝制的約書中，承認了君主政體是羅馬尼亞民主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就在議會通過廢除國王的當時，也就宣布羅馬尼亞為人民共和國的法案。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工人社會民主黨，激進黨，農業聯盟，保加利亞工人社會民主黨，激進黨，反動派的東正教黨，民主黨，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七日人民議會選舉結果，祖國陣綫在四六五席中佔了三六四席，其中共產黨佔了二七七席。匈利獨立民族陣綫有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民族農民黨和小地主黨。一九四七年八月卅一日人民議和選舉中，獨立陣綫獲得全部選票百分之六十五點九，全部選民中百分之三二點三是投共產黨的票。南斯拉夫人

民陣綫有共產黨，共和農民黨，聯合農民黨民主黨，和獨立民主黨，共產黨團結了一切進步力量。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制憲議會通過取消卡拉喬治維奇王朝，宣佈南斯拉夫為人民共和國，並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卅一日通過了南斯拉夫人民聯邦共和國憲法。

由於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新民主革命的實踐內容，必然是土地改革與國有化政策的推行，前者在消滅封建的地主制度，廢除舊有的農業生產關係，增進農業生產力；後者則在肅清半殖民地性的官僚買辦資本與列強資本。在土地改革上，東歐新民主國家是得到了全部的成功，歸納他們成功的關鍵有下面三個理由：第一是有了一個包括一切革命黨派而以勞動人民為骨幹的聯合政權；第二土地改革是全國農民意志的集中表現。第三是以貧農與小農為基本對象，而以大地主與富農為清算對象。（參看陶著新民主國家論卅二頁）但這種土地改革不是給土地關係總清算了呢？很明顯地封建的土地關係是完全給清算了，但耕者有其田的結果，仍然保留了小私有生產制度，這種私有制度的消滅，必須待到社會主義革命去完成，因為耕者有其田只是新民主主義土地改革的最低綱領，土地國有才是土地改革的最高綱領，可見新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是相連貫的。因此，一切半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其間必然要經過一次新民主的土地改革。

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的實行，一方面澈底的掃清了國際獨佔資本與買辦資本，他方面解放了民族資本，但國有化政策與新民主政權是必須結合在一起的。沒有新民主政權的保護解放了的民族資本與中小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得着發展，很明白地，在新民主建設的初期階段上，私經濟的繁榮，對國有化政策的推行是有着莫大助益的。

土地改革與國有化政策為新民主國家鋪上了一条產業革命的新路，它給各新民主國家在經濟上免除了騷亂，恐慌與失業；在國際關係上取得了獨立的政治主權與經濟主權，脫棄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枷鎖；在國民所得的分配上，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一般地提高了國民生活水準，勞動人民富裕起來了。艾倫在論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時代第八年廿八期）關於新民主國家的評語是非常允當的。他說：「新民主國家的建立表示了有利於社會主義世界關係的基本改換。這些國家從獨佔資本的世界軌道上，從帝國主義的範圍裏撤退出來。作為在戰時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一個自然結果。新民主國家的人民，在他們自己的方式中，符合於他們國家的特殊情況，正在擴大世界的社會主義的部門。雖然在他們發展的形式和速度上各有許多不同，人民國家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在這些國家裏，優勢的地位已經獲得，以進行社會主義的轉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

民主化教育是個性教育

程仲文

我在傳統教育的範疇之中，做過各級的學生，

也做過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教師，充過最高行政機關中的職員，也提議過這樣的教育制度。我對傳統教育實在有一個險證愈確的評語：即傳統教育是

反民主教育。支持這評語的論點約有下述四端：
一、就人的關係說。傳統教育是教育部長，決定大學校長，校長決定教師，教師決定學生。依教

育原理說：「真實的學習都應該從學習者的現狀出發。」這句話在傳統教育中却應該倒過來說：「真正教育應該由教育中樞決定一切。」於是校長受政府的監督，教師受校長的領導，學生又受教師的指揮，教師總說要學生怎樣怎樣，受「訓練」學生成怎樣怎樣，國聯教育考察團的評語說「中國的教育，只有學生們聽的，沒有學生們說的。」這真是一語道破。實則教師在學生面前雖如此權威，但在校長面前又覺深受束縛，校長之對官廳也是如此。如此說來，教師對學生，（上級對其下層屬之）豈不如君主對其庶民？這樣的教育，豈不是反民主的教育？

二、就制度說。現行學制系統是僅以年齡為劃分的系統，其他生理與心理狀態的不同，則置之不問。所謂大學、中學、小學，完全是從年齡分別出來的，但就教育原理，年齡的意義，可分兩方面即「實足年齡」與「智力年齡」。(Mental age) 從智力年齡劃分系統，倒還合理；以實足年齡劃分系統，就非常不妥。至於生理狀態，也應是系統劃分的依據，但在現行學制中却並不重視這個原則。就因為這樣的學校制度，把兒童中「上智」與「下愚」全部抹殺了。生理病態兒童，更受到了遺棄，這不是戕害人性嗎？叫學生勉強適應於這個硬性的不合理的制度中，豈不殘忍無道？所以說是違反民主的。

三、從教學方法說。級制既經編成，教學就無法跳出「如來佛的掌心」，教學是訴之教師的自由，絕不受學生學習情況所左右。雖然在學記中說過「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教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但「循循善誘」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而不是今日的教師。今日的教師自由地教，要快則快，要慢則慢，要教

則教，要停則停，不問學生如何。教得快，教得多，學生不懂，或來不及接受，考試「不及格」，「留級」，便是，教師並無責任。這樣的教學方法，是片面而獨斷的教學方的，實在也就是反民主的作風。

四、就課程說。國定本的過程，鬧了不少的笑話，然而政府可以不顧民間的輿論，與教學的情況，只是不能忘懷於劃定「課程標準」，印刷「國定」教材。課本劃一起來有沒有好處呢？我們只要想父親讀的書給兒子讀，哥哥讀的書給弟弟讀，上海出的書給台灣人讀，重慶印的書叫青海人讀，這是否合適呢！我會聽到顧樹森先生任教育部國民司長時的一篇話說：「國民教育推行的困難，什麼都可以解決，只有課本問題，不容易解決，因為教育部編不出一套全國通用的課本。」顧先生實在太天真說！「全國通用」的課本難編，但我們若動他放棄這個全國通用的觀念，也許困難也可解決了。課本既着重於「全國通用」的觀念，當然也不免有「削足適履」的毛病，叫學生不能獲得最實用的知識，這不是反民主的作風是什麼？

一一

針對上述四點，我們要解放教育，要引導教育踏出傳統的桎梏，當然只有使教育走向民主化的大道，纔是光明的出路，但如何使教育民主化呢？或者說什麼是民主化的教育呢？民主化的教育只是個性教育，使教育民主化，也只有實施個性教育，支持這個斷語的，也有下述三個論點：

一、教育民主化的第一條道路是「自由」的口號爭取制度的民主化。在三十多年前波蘭愛國志士喊出一句口號說：用教育爭取自由——(Through Education to Freedom!) 在政治失却民主的時

候，自由也遭受到了桎梏，教育在這樣的政治之下成爲它的尾巴，統治者心目中的學校，不過是「奴才養成所」，統治者把教育經費的支付認爲是恩惠的維持，於是不論是教師或學生，不復是爲學術而教學，却是爲了做家臣而讀書，教育談不上民主化，要民主化只有武裝教育，使成爭取自由的戰士。要展開教育的爭自由運動，便應該澈底革除以命令式的絕對服從爲能事的教育制度。今日的教育制度，已經離開了「教育」而偏重「訓練」，什麼事都可以「訓練」。但我們知道「對動物可以訓練，對人類却祇應是教育」，訓練制度的澎湃，即反映了教育上民主主義的奄奄垂危的事實。現在，我們喊出自由的口號，一面要武裝教育以爭取自由，一面要革新教育制度，使自由成爲教育制度的精神。自由的教育制度必須做到發揚學生自治自動的精神，如陶行知先生創辦的曉莊、山海學園，育才學校，即充分發揮了學生的自治自動的精神，這真證實了葛隆維 (Grundvig 1782-1822) 所說「只有在絕對自由的條件之下，精神機能振奮起來」的一句話。然則以自治自動貫注教育制度的教育，又是什麼教育呢？我們說這只有尊重個性的個性教育，纔能克盡功能。

二、教育民主化的第二條道路是以「平等」的口號爭取機會的民主化。傳統教育是裝飾品教育，它的本質是貴族化的，是排擠多數無錢無勢的兒童的。現行教育兒童入幼稚園、入小學也要考試，也要請託介紹，這不是說窮苦的無勢力的平民子弟便不許受教育嗎？這真是件聰明的事情，統治者一面喊「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的口號，一面又不許無錢無勢的兒童讀書。所以到目前爲止，中國的文盲依然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統治集團卅年來「政績」的最「好」表現。董渭川說：「據

全國第二次教育會議估計成年文盲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六。二，但這個假定是掩耳盜鈴的把戲，連外國人也騙不了。近年來仍舊時常看見外國人每逢談到中國問題時，總是首先指責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其談到機會平等，我們不能不見我們的生理與心理病態的兒童，也都沒有受到他們應受的教育。這也是違反民主化的大事。現在的學校規則都是所謂普通學校一類，祇是為一些生理正常心智平庸的兒童而設，天才教育與低能教育，根本沒有，聾啞盲殘廢教育，政府也不管。這不是反民主是什麼？我們的民主教育，必須要教育機會平等，教育真正普及，各個性兒童，都能受各種教育，完全順適兒童心理生理狀態，以決定各自應受的教育，與若干教育。這種順適個性的教育，就是民主化的教育。

人類學在種族研究上的貢獻

對於人類學 (Anthropology) 的解釋，通常都叫作「人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an)，其定義則頗不一致，美國人類學家韋士勒 (Clark Wissler) 說：「人類學是研究人的科學，包含所有把人類當做社會的動物 (Social animal)」，人類學是一羣由探索人類起源而生的問題之總名，「英國人類學家馬列 (R. R. Marett) 說：「人類學是沉沒於演進的觀念之全部人類史，以在演進中的人類為主題，」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馬林斯奇 (Bronson Malinowski) 說：「人類學是研究人類及其在各種發展程度中的文化 (Culture) 的科學，總括說來，人類學是用歷史的眼光去研究人類及

三、教育民主化的第三條大路是以「解放」口號來爭取教育內容的民主化。教育內容的民主化有兩大綱目：一是思想解放，二是學術獨立。墨西哥革命先驅者在三十年前會勇敢地揭帖出「用教育獲致解放」(To educarse es liberarse) 的標語。這時教育變為爭取解放的武器，但我們知道先決的條件是教育本身的獲致解放。目前我們中國的教育被統治集團束縛得麻木癱瘓了。特務統治把學生監視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牢獄之門大開，廣事搜索教員學生前去受「感化」。學生成為「政治的賭本」(歐元懷語)，統治集團却慣於收買學生做特務，雖然他們拋出「職業學生」的帽子殊不知正是他們自己的看家本領。我們更須檢討的是一黨化教育」的施行，把教育作為統治者的私苑，把學術作為統治者的護符，把教師與學生作為他們養養下的奴才。三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黑暗，比之中

其文化之科學，包含人類的起源種族的區分以及物質生活社會構造心靈反應等的原始狀況之研究，換言之，人類學便是一部人類自然史」，而歷史與人類學的研究是不同的，歷史是關於某個民族的生活的過程，是較為特殊的研究，人類學是關於全人類的生活的過程，是較為普遍的研究。因為歷史注重時地與個人的記載是較為具體的；人類學只論團體不問個人，時地也只紀大概，是較為抽象的。歷史的範圍幾於全在有史時代及文明民族，人類學則偏重在史前時代與野蠻民族，即是說，歷史是研究已知的人類，人類學是研究已知及未了知的人類。人類發生最少在五十年以前，而人類能自己紀錄的

古時代西洋史上的 Dark ages。還要黑暗得可怕。這要縛思想統制學術的辦法是最反民主的。因此我們要推行教育的民主化運動，就從從事於思想解放與學術獨立的運動。如何達成思想解放與學術獨立呢？這就要使教育內容為發展個性而非束縛個性的教育內容，纔能達成任務。因此我的結論是爭取教育內容的民主化，也只有實行個性教育。

二二

教育民主化，應是今天一件迫不容緩的政務。民主是二十世紀的大潮流，中國的統治者企圖從這大潮流的底層折向逆流的一切掙扎，現在已經證明它是必歸失敗了；教育的民主化將與政治民主化同時實現，但我們更企望教育界本身多盡催生與栽培的責任，趕快促成教育制度的自由，教育機會的平等，教育內容的解放，亦即趕快展開基於尊重個性，順適個性，發展個性的教育民主化運動。

李成蹊

時代最多不過八千年，在其餘四十九萬年間人類的情況究竟如何？惟有靠人類學的研究才能得知，所謂人類學的目的在「還元」(Reconstruction)，就是要把人類已經湮沒的過去的行為考證出來，其行為也就是人類學所研究的文化現象 (Cultural Phenomena)。文化是什麼？人類學家泰勒 (E. B. Tylor) 所下的定義是：「文化乃是一團複合物 (Complex Whole) 包含智識信仰道德藝術法律風俗，以及其他凡人類因為社會的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及習慣，」韋士勒則解釋文化便是所謂「生活型式」(Mode of life)。人類無論文野都具有「生活型式」，也都具有其文化。文化是人類行為

的結果。人類學的功用就在於探索人類文化所蘊藏的原理，如文化因何種條件而發生？文化的發展如何程序？文化何故有不同的型式？文化各種要素語言文字思想的起源演進如何？這些，都是現代人類學家所亟欲追求解答的課題。在舊派的人類學家大都把人類學當作專門研究人類軀體的科學，新派的人都把人類學研究是包括人類與其文化的，因為文化是動的即用的方面，而人類的軀體乃是靜的即體靜的方面。文化與軀體有密切的關係，合之乃成為動靜俱全即體用兼備的全個人類。

普通所謂解剖學心理學生理學三者都是研究個人的。惟有人類學則是研究種族的，即是說人類學的研究以種族為對象。種族是人類的成員，種族是人類的中心，所以，人類學的貢獻重在對於種族的研究上面。種族研究的目的在對於人類系統 (Race history) 觀點的改正。已往的人類對於種族的觀點認為種族都是在簡短時期內全由一對單純的父母傳下來的，因為當時的宗教背景與智識程度都視為世界是不大的，而人類是不甚有多大差別的，依其宗教哲學上的錯誤見解，認為一切原始種族都是夏當 (Adam) 的後裔。更有一種最早的說法，即以爲一切的印第安人是從「失蹤了的以色列族部」(Lost Tribes of Israel) 傳下來的。即近代許多歐洲的學者，其觀點仍是襲舊的，不認認所有的原始民族爲人類學上的現象 (Anthropological Phenomenon) 並且把大多數非基督教的民族視爲人類學上的現象。因爲在哥倫布未曾發見新大陸的一九四二年以前，有教養的歐洲人士，對於人類生活，眼光似乎都很窄小；他們所確知的，只是歐非亞三洲的交界地方。此後的一二世紀之中，探險的事業使他們知道新航線而發現了美洲的太平洋群島嶼，除了已經知道的人類團體以外，又新知道了許多地方

的奇異民族。最初英國和法國的皮毛公司，聘請了一些很有學問的人們，曾深入美洲的印第安族部以觀察其生活型式，著了好些書籍，後來都成了人類學上的重要文獻；而傳教士的許多文字記載，對於歐洲學者也供給了人類世界之大觀。因他，在十九世紀時即已開始了一種潮流，對於歐洲以外的諸民族之認識，要使之系統化，並加以解釋，以成爲有用的智識。其時其他諸科學正在蒸蒸日上之發展進程中，特別是植物學和動物學的研究，對於這方面的科學內容大加豐富。首先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尼阿 (Linnaeus 1707-1778) 之分類系統給予一個科學的基礎，其後是英國學者普立拆德 (Pridmore 1780-1828) 供給了各方面以研究的材料。這種研究，可以說在殖民時期，英國的人類學家領導人類學前進。自美國獨立後，美國的學者就領導人類學前進，尤其在最近這半個世紀中，美國以及許多歐洲國家的人類學家，差不多完全獻身以研究印第安民族問題的「二方面」。其他英國和法國以及斯干的納維亞半島上的人類學家，則專門研究西歐的史前人類 (Prehistoric man)，并由此而成爲世界上的考古學家。

人類學的研究，首從人種分類開始。早期的人種分類是以地理爲標準的，每洲一種。林尼阿曾把人種分爲四種：歐洲之白種、亞洲之黃種；非洲之黑種後布盧門巴哈 (Blume Neach) 在一七七五年又加了第五種——海洋之棕種。自以後，各國學者對於種族分類之追尋各相懸殊。赫克爾 (Haeckel) 在一八七三年祇尋出十二個種族，但是幾年之後就增至三十四個了，托賓那爾德 (Tobinard) 在一八七八年找着十六個，幾年以後又加了三個登尼克 (Deniker)，在一九〇〇年決定分爲六大類十七小類再下面是廿九個民族，愈分類愈加複雜了

，在事實上講，種族大體分類是可以的，詳細分類便不容易了，因爲以身體構造爲標準的分類法，不下十餘種之多，但沒有任何兩種以上是同意的。這由於人類各種族間的軀體沒有一種很顯著的確切的特殊現象，以互相區別，祇能用此部而不能同時另用他部，但是祇用一部時他部就顯有許多互相出入之處了。所以，根據兩種特性以上分類，結果便極其紊亂了。以古代歐洲各民族而論，在難居了兩千年之後，除了北歐往埃斯蘭 (Iceland) 移居了一千年的「一部居民以外，差不多沒有一個血統純粹化的民族。現在「部份學者動輒曰「英國人種，中國人種」，實際上種族是生物學上的觀念，并不限於國家境界的；國家只是政治上的觀念，不限於一個種族的，如過去奧匈聯邦有八個互相敵視的民族，俄國有四十八個不同的民族，中國也有五大不相類屬的民族，至於在生理上各種族間的差異並不十分顯著，已如前述。這種實例，德國人類學家安蒙氏 (Amnon) 曾在阿爾品 (Alpine) 人中親自檢驗過幾千軍士，但是他終不能得到一個完全合乎標準的阿爾品人：所以，立普力 (Lippert) 在「歐洲種族」一書中稱：「我們現在很不容易找到一個人，也許從來沒有過各方面都能與種族符合的人」，普立拆德在其「人類之自然史」裏會謂：「人類之各種族沒有一種顯著而永久的特點可以彼此劃分清楚，各種差別隨時可以變更，而彼此之複雜頗難猜測」，布盧門巴哈也可以說：「因爲各種族之錯綜紊亂，實不可思議」，可見，純粹的種族只不過是一種理想，已由人類學家證明明白了。

其次，有許多學者常以文化語言爲標準來區別種族的，這種劃分其實是不能成功的。因爲，直到今日沒有某種文化或語言是屬於某一民族的。由於文化有如潮水之激盪，時而在彼，時而在此，數千

年之前，文化之胚胎於亞洲而傳播於歐洲，有由較高的文化傳於較低的文化者；有由較低的文化移於較高的文化者；進退不定，昇降不一。吾人讀文化史愈足證明兩民族相接觸時，即互相傳播其文化，任何語言地理之隔閡均不能阻止文化之交流。所謂種族文化，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至今沒有一個人類學家能夠劃出一個純粹的種族來。所謂純粹的種族並不存在。即或最古時存在，後來互相混雜綜合也就不純粹了。沒有純粹的種族，自然不會產生純粹的種族文化，所以，我們祇能把它區別為比較的種族文化，如法蘭西民族文化，中華民族文化，都不過是抽象的名詞，以供於應用而已。但是，會有許多學者堅持一個種族有一個種族的特性，此種特性源於遺傳。優生學家們更贊成此說，所謂「同類產生同類，優秀之民族產生優秀之孩子」。霍布金斯（Hobbes）大學生物學家配爾（Pearl）曾斥「優秀的特性」說：優生學家們所以公然宣言，「乃是由於那些過於熱心者以為社會上許多複雜混亂的現象，如貧困、癡狂、犯罪、娼妓、癩癩等均歸於某種遺傳因子，或是簡單而未成立之孟得爾的原則」，哲林斯教授（John Haldane）并說：遺傳並不是什麼東西，也不是什麼力量，我們最好還是棄掉這種觀念。「譬如若蠅必須有五十個遺傳因子集合纔來構成某種特性，如「紅色的眼睛，換言之，一個蟲類的眼睛可以有五十種的變化，可能預料的特性極少。普通父母對於子女的特性，預先毫無把握。一個遺傳因子也并不產生一種特性，「幾種特性不是同時遺傳的，某一種材料在某種特殊情形下，而產生某種特性這才是遺傳的」，所謂特殊情形下，即是所謂環境，因為遺傳的根本是基於環境的。每一個種族都不過是各自在其社會環境中，由長期而緩慢的演進以完成的種族之混合物，然後在固定的土壤上開起花來

，再由其社會的圍繞物鑄成一個定型而已。所以，魯克斯曾說：「種族不是原因，而是結果」。製造種族，轉化種族，不斷的變更種族的乃是環境。縱然有一些種族的特殊性——遺傳存在，它的影響至多也不過是第一次的。克羅伯（Kroeber）在其大著人類學的開篇上曾說一個警喻，他說如認為黑人的黑臉孔和厚嘴唇是遺傳的，可以用生物學的原理來說明，但他們會唱美國歌做浸禮會的教徒，天雨也懂得穿外套，這也是遺傳的嗎？倘若不是，必得求之於別種解釋，所謂別種解釋，便是指社會環境。哥爾登（Galton）的祖先遺傳律，以為對於人類的本質，遺傳的影響較環境的影響為大，其實是錯誤的。至於以生理上的差異便以為是遺傳的差異也是不通的。否則白種人中所施用的醫學原理，在他種人中就無法應用了。雖然，在某種範圍內身體之構造是遺傳的，而關於此種遺傳之定律也大都是知道的，以人類文化為標準而把人類劃分為千種族，對於社會人類學家是很方便的，不過這種分類對於遺傳并無根本重要關係，因為文化之差異祇能認為歷史之原因所造成，而不能視為遺傳之不同而造成。蓋歷史之原因對於文化之促進，實居其大部，所以，各民族文化之差異，也祇能追根於歷史之原因，而不能追根於先天差異之原因。

從上所論，可知根據於遺傳的特性也不能得一種令人滿意的分類法，但是依然有若干人類學者迷信遺傳對於種族的影響如奧茲本（Osborn）武斷的說：「種族包含着遺傳，遺傳包含一切道德社會智識之特性，這些特性又是政治之基礎。因此，歐洲之民族史可說是歐洲之遺傳史」，早於一八五四年高賓紐（Gobineau）著「種族不平等論」，其後，拉普治（Lapouge）也繼起響應，他們認為種族是不平等的，種族有優越與低下的區別，前者可

以進步，後者極少希望。文化與文明，都是優秀種族所創造的。且說：「大多數的種族，永遠不能進入文明的領域」，而特別提出白種諾迭克（Nordic）人為最優秀的民族。哥賓紐更認為祇有雅利安族（Aryan）建立了一個真正偉大的文化。米勒（Max Müller）又著「雅安之語言」，間接無意識的造成了雅利安民族的思想。一部份學者更崇拜那丹民族，布列漢（Bridgman）說：「現代之政治組織及科學發明，大部份是由那丹民族供獻的」由格蘭特（Grant）所著「偉大民族之衰微」出版後，那丹民族的思想便深入一般人心了，以致在人類史上平添了一個種族偏見（Racial Prejudice）的毒瘤，每個民族都以自己族的文化特別高，他族的文化特別低，似乎上帝或造物主特別眷顧己族，而世界也彷彿專為己族而設的；英國人常有這種論調：「上帝啓示於人類，以英國為最早」，德國的威廉第二說「上帝對於德國民族之前途，有一種特別的安排」，日本人以為太和民族是最高尚，最英武，希特勒誇稱雅利安人最優秀，最純潔是上帝的選民（Selected People），負有教導劣等民族的使命，故不願一切採取排斥猶太人（Antisemitic）政策，迄至今日。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 Saxons）仍然覺得他們才是上上民族，應當統治世界的，有色人種是不配負起這種責任的。近代戰爭所掀起的因素雖多，種族自大狂實居其最大因素。德國人常引進化論來辯護，以為戰爭是自然淘汰不適者和保證進化的方法，同時把達爾文主義盜用，認為生物間的不斷競爭，和一國向他國作戰，這兩種歷程是相似的，因此，而形成所謂國家主義派，所謂國家主義派依他們的解釋是：戰爭的動機是在於保存民族的特性，他們相信把各國混合起來，就會淹沒了民族性，事實上，人類學家已經證明鼓吹種族血統

純潔無憑證，以形體差異代表純粹民族無憑證，種族混合減低優秀民族之天才亦無憑證，因為人類形體之進化，由於不同的環境，不同的食物，使他們各種器官特別專化，某種器官只能維持原狀或竟致退化，結果遂使各種形體間呈現出很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都是適應特殊環境的結果，而不是先天遺傳的原因。所以，形體的比較，是不足以證明種族進化程度的高下，更不足以說明種族品質的優劣。我們每每以為形體粗魯的便是野蠻的表示，是不正確的看法。披爾遜 (Karl Pearson) 曾對於這問題經過長期研究之後，他認為人類之形體與心理之人格並無任何關係。法國著名解剖學家曼羅夫利 (M. Aronvise) 對於人體之構造與智力也發現不出什麼關係來。馬耳 (Mull) 曾專門研究腦筋重量，結果他以為不同種的差別尚小，同種的差別反而太大，

可知一種民族智力的差異祇可說是數量上的分配，而不是質的不同，因為我們深知歐洲人產生領袖人才之趨勢比黑人為大，事實上并無很大區別彼此互相關聯，祇有幾個少數的優秀腦筋為非洲一時找不着的。同時，因為智力是複雜的叢體，可以分析為若干單位，智力有先後差別，古代莫斯基摩人 (M. Mo) 已有很顯著的工業了，但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仍未脫去野蠻狀態。古代中美洲的馬牙人 (Maya) 在建築上已有最動人的成績了，但在冶金學上却遠遜於非洲黑人。

綜結說來，以現代文化的成績，不能預測各種民族的能力，因為，就是現存民族中也有許多野蠻的遺存物 (Savage Survivals) 如迷信魔術裝飾宗教等，很可看出由原始時代遺下來的原素，克洛特 (C. Clod) 說：「我們人類做感情的動物已經有幾十

萬年了，做理性的動物還不過是昨日才開始」佛洛則 (J. G. Frazer) 也說：「現代人類與原始人類的相似還多於其相異」。又如埃次勒 (G. Eichler) 說：「所謂現代的文明其實很像『文化的白粉水』刷的一領薄外衣，時時都有失掉的危險」，我們如果拿文明與野蠻民族來比較，從機會與成功方面看來，我們總覺得我們高尚的文化是很可慮的。所謂野蠻民族，也是我們的「骨之骨肉之肉」，與我們同其血緣的。歧視與輕視都是不應當的，因為，人類學家對於種族成功與血統純潔之相互關係根本找不出什麼證據來。種族的智力在人類學上只有先後的差別，而沒有優劣比較的。種族的地位在人類學上是一律平等的而沒有高下分野的，這個結論，便是人類學在種族研究上的重大貢獻。

通 訊

台灣的內在危機 (台北通信)

本社記者 林伯聰

孤懸東南海的台灣省，現在成為動盪時局中最惹人注意的地方。國民黨黨所屬的事業單位，紛紛遷台；中央大員黨所屬之軍隊，聯袂來台；他們異口同聲說台灣是天下的安樂土。尤其是陳誠將軍的主台，海空基地的移台，台灣漸成爲安全的獨立王國。可是台灣人在暗中啼哭，台灣人在驚惶恐懼中戰慄，他們差不多不知未來的命運，是吉是凶。因此，台灣現狀并非毫無變遷，實在值得注意。

今日之鄭成功

台灣人心坎上的聖賢豪傑，是明末的

鄭成功父子兩代民族英雄。台灣人祀奉鄭成功爲神，台北台南均有「鄭成功廟」。今日國內大勢，又面臨明末的前夕，今日朝中大將又效法以台灣爲民族復興根據地，向鄭成功學習了。去年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節時，何應欽蒞台講演，盛讚鄭成功是反抗外來並得到台灣民衆的支持；他并暗示今日需要有一個鄭成功時代。同年十二月廿一日上海申報社論，大尊陳誠出長台灣揮揚，它并提出：「昔日治理台灣最著成績而彪炳史乘者，當推鄭成功父子兩代民族英雄。明將鄭成功曾擊敗荷蘭人光復台灣，以台灣爲復興大明的根據地。成功父子治台凡二十三年，奠定了建設的基礎，提高了民族精神，雖其後遭受日本侵

略，失守了台灣，可是民族意識與復國精神，已生根於台灣人民；現在大江以北一片烽火，唯有台灣三島屹立東南海之間，故如何發揚鄭成功父子的民族精神，以台灣爲復興中的根據地，當是一件很有歷史意義的事」。這份報紙傳遍到台灣，於是台灣人輾轉相告，今日的鄭成功，便是陳誠將軍。原來，陳誠來台休養，是預有鄭成功抱負而來的。

新任台灣省主席于一月五日就職，前任魏道明于當天交接後即飛離台北。陳主席就職發表施政方針，共有五項：(一)使台灣成民主主義實驗區，不僅增加生產，且使分配合理，最終目的在實施生活必需品全面配給；(二)使台灣成爲民族第一

台人對政府的態度

台灣人有一種「懷舊」的觀念，這是多數台灣人生根于保守心理的結果。陳主席台，一切措施太硬化，以致發生「二二

八、大流血事變，後來蔣總統允准台灣提早自治，不派軍人主持省政，這件對於大總統才平復下去。陳儀治台的政策很多，臺下大受稱揚，致引起台灣人民與省外人（台灣人所謂之「阿山」）的對立。事情過久了，有的台灣人開始認解陳儀，第一、甚為陳儀本人不吝「罰下自然例外」生活法則；第二、陳儀維持台幣有信用，省幣法非法失敗的過路，確乎拯救了台灣人民的財帛。

對近期以文人身份主台，計時一年又七個月，他不比陳儀差，但他以自由主義自居，表現一種與蔣相違，在台灣人眼心目中留下不淺的印象。在施政上，他尊重憲法，使台人新活生法保持相當安寧；他尊重學運，使台人的民身起無憂，或獲戰前多效果，而使台人一一如金石。此外，尚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私恩權柄對於他監督在任內地位復，比較于台人不能快慰的，是使軍事要員與國人的忠意，曾遭風台台灣為國人的國民地，安全失去一對一的觀念。大計數來，台人對於他有一相當的滿意。其對陳儀所深著的意思。就調解台台後，才有一位軍人——一位教養河天的將軍主持台政，於是台台人一月五日那天，一萬個的派送走了他。

台灣人對陳儀主台，蔣經國叛逃，初感惶恐，尤其是省省縣各級台籍公署官員，他們感將來無業之苦。台人是最怕失業的，他們并非無業過他鄉陌生的習慣。於是，「二二八」事變前夕的情況，在陳儀就任時，又開始醞釀了。幸好美國人開始注意，陳儀的情報靈通，怕這國民黨發生自取之危。因此美國表示台籍的統治力不可太強固，因此不歡迎某巨公和蔣經國立即來台；陳儀也少說話了，并中止了各級機關改組的計劃。因而台籍的現狀，才維持了表面上的平靜。「二二八」又來了的

流言，漸漸成為過去。

先前報紙充滿了火藥氣，一篇一篇的反共講演，刺激著每一台籍人，而今也暫時收歇。表面上，台灣依然維持平靜，實質上，仍積極準備以此為備戰的基地。

台灣可為基地麼？

台灣真能成為備戰基地麼？這件事，誰也答覆不出來。現在姑以台灣人力和物力來說。第一令人想到的當然是壯丁，台灣六百五十多萬人，壯丁可能有六十萬，可是台灣復役了三年，沒有抽過壯丁，現

粵省的軍事新部署 (廣州通訊)

本社記者 巨吼

自總統的元旦文告發表後，和平的空氣雖然不是絕無，但政府在南方的備戰部署工作，是依然緊張積極進行着，與南京的為難旋恢復國共和談忙碌情形，恰成明顯對照。在元旦文告發表後短短的個把月來，政府一連發表了：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省警備總司令，蔣經國任台省黨部主委，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雲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等的重舉任命。余漢謀為對象看來，政府已很明顯地在苦心積慮中，於廣西南的半壁河山，預備下一着「棋子」，來準備應付一如其寬無誠意，則不得不周旋於台(總統元旦文告語)。

隨着時局的演進，今日粵省的軍事問題，已不僅是維持省內治安這樣簡單，而將是一「敵軍」權權時，國民黨的政治生命延長之「資本」，宋子文在軍事上畢竟是外行人，而目前他的軍事副手黃鎮球，黃地位等又都是二三流脚色，以現在廣東的國權等又都是二三流脚色，以現在廣東的地位重要，他們不能揮起「大場面」的，因此政府在南方的重新部署中，不能不要推出一個，在粵軍中較有歷史，而又可「放心」的人物，來主持粵省軍事的策劃

在要抽，要練兵，時間上固有問題，但根本的是台灣人對內地人一片惡感的情緒下出來不出來；出來了，拿到武器後，作些什麼？也沒有誰敢保(台省今年不征兵)，至於物方，以最近迫的米而論，台灣今年可出來一百萬噸，而台灣所需是九十萬噸，十多萬噸的輸出有什麼用？而且這數目早已透支了。另外多餘的便是糖，可是糖到今年春天天出貨時，最多也不過四十萬噸，但糖不能當飯吃。

至於發展台灣工業，今日第一問題是電力不夠，新設廠事，已不可能；連台灣

協助宋子文安定這塊國民黨的發跡地。於是，在民二五年南天王時(陳濟棠)，以倒戈姿態而變成為中央系軍人的余漢謀，就在宋子文的力薦下出任了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於元月六日蒞穗，那時說去發任命。他就成了當時在粵軍政紅軍中最忙碌人物，整天接見各軍部，聽取各方意見，公館門前「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盛。在過他底人，事無不辦，不少脫去戰靴的廣東鄉團人，又重新換穿上了征衣。前第七戰區中下幹部，已紛紛在第九訓練處報到，綏靖開始着手把原駐粵東的三個師，擴編為三個軍，據說在必要時更軍備擴到二十個師，成立一個強大華南軍團，余氏於一月十六日擴同重建軍軍，及粵省的綏靖計劃，飛京晉謁總統，十八日國防部就發表了他出任長綏署主任來，是親親的廣東人都說「我們的余老總回來了，是有辦法的。」

辭者在粵軍將領中，也是比較接近中央的人物，在戰時長沙之役，他的聲譽比之余漢謀還響亮。宋子文自去年年底在京參加國是會議，於今年一月三日返穗後，就先後一連派出大員；省府高級顧問陸文

最需要的肥料工業中，想設一個增設工廠也沒有電料，要設，需先增加電力設備，而增加電力設備為時至少二年。以上這些問題，只要稍稍一想，答案便都是否定。

那麼，台灣地方可以貢獻什麼？它只是一個設備不良的防空洞，流彈也許可殺一擊。如果時代的炸彈投來時，這個安樂土便吃不消了。不過在平時，它仍不失為安全的地方，喘息休養，委實不錯的。(二月七日寄自台北)

廣州的共軍，以海南島方面的馮白駒「瑯嶼人民解放軍總隊」為最浩大，約二十萬餘人，經常出沒於江山，文昌，安定，澄邁，臨高，陵水，樂會，陵水，白沙，萬寧，臨高等縣份，並自委出縣長，自行他的「土改」新政。宋子文的開發海南島計劃，就是因為有這一枝「解放軍」存在，而無法推行。在南路方面，遠在抗戰時張夷事件發生後，治安環境就特別複雜，粵省政府一向就靠賴長莫及似的匪之不理，至令共軍之營日以累大，自去年七月十日湛江市(前廣州灣)第一大連擊戰後，才手忙腳亂地，成立第十清剿區司令部，派出以打硬仗出名的張君萬來鎮鎮，但只四個月後，却又發生保安第十團陳一林叛變，殺斃清剿司令官張君萬，副司令鄧

伯油，再度進擊江市的事件發生。目前敵處於這方面的共軍，在吳川北縣兩等地區為馬平約千餘人，欽防，合浦，靈山等縣邊境，及遂寧，海康地區，與越桂邊區十萬大山等地，李強，鄧坤廖約四五千人，連部份的共軍，現正日夜圖謀與匪軍在海南島的馮白駒，取得聯絡，遂而控制整個雷州半島的粵省南路部份，並將東廣東治安問題上，最大心腹之患。東江方面：和平，河源縣之林義順部約千餘人，紫金，海豐縣邊境，林楓，藍雲等部約七八百人，其活動地帶為龍川，和平，連山等縣。韓江方面：劉漢江，丘陸軍，馬鏡友，張希非等部三四千人，盤據鄉山，瓦田，橫山，南山等縣份設卡收稅。西江

政院南遷後的廣州 (廣州通訊二)

本社記者 巨吼

與總統宣佈「退休」的同時日，總統府頒佈了如下的任命：(一)廣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宋子文呈請辭職，宋子文免本兼各職。(二)任命薛岳為廣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三)兼廣州校培公署主任宋子文免兼職。(四)特派余漢謀為廣州校培公署主任。(五)特派薛岳為海南特務行政長官，兼海南建省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六)特派朱鎮球為福州校培公署主任。(七)特派張雲為廈門校培公署主任，而把海南各省，重新作一次有計劃的備戰部署。尤其是廣東，級署主任余漢謀固然是軍人，而其主席薛岳亦是軍人，海南特務行政長官張雲亦是軍人，最近由歐美返穗，行將出任要職的李漢魂亦為軍人，連廣州特別市長歐陽駒也都是軍人出身，成了清一色的軍人世界，充滿了濃厚的火藥氣味。

隨着孫科與陳誠於二月四日黯然抵穗，政府南遷之事實從去年十一月開始會開始，終於由薛岳，而見其行動，由行

方面：廣東，懷集及綏江沿岸，謝均歐新等部二千餘人，新興，雲浮，陽山縣等敵軍飛部六百餘人，老嶺山，阜卓山一帶梁文輝部六百餘人。西江上游，鬱南，桂河鄉等附近山嶺密林裏，潛伏着李福靜部三千餘人，不時向河上的船隻「游擊」收稅，北岸的徐德部六百餘人，在德慶，封川縣一帶活動，或有縣政。悅城附近，金滄沙，樟洲角河間，聚集英國強，黃飛虎等部，在河面設卡抽稅，打起「保護安民」的旗號來收稅。北江方面：粵閩湘省邊境，劉雄飛部千餘人，蠢動於南雄，始興，新豐，佛岡等縣，孫運，英德，曲江縣有新技全黃相帶部二千餘人。中區方面：東莞，寶安等地閩武部千餘人，在中港邊境一帶利

動到今日而正式實現了。派吳二巨頭今次的來穗，帶給廣東人的，除了金券瘋狂貶值的金融巨災外，更帶來了一個「戰鬥的明天」。

顯然地今次內閣的遷移來穗，李宗仁及留京派立憲黨都極表不滿，他們都認為在和平調處尚有一線存在的不日，此種行動無疑是給以對方一種的一個機會，而勢將增加和談的若干困難。再從法理上來講，這會否國家最重要政策，應由總統下正式命令公佈，而今今日這項，却隨着政院的遷移，已完全離開了南京而移到廣州。以外交部為例，各國使節在南京已不能與外交部直接辦理任何一項交涉事項，而須透過其在穗之聯絡人員，來與外交部辦理。雖然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什麼跡象來證明如外電所傳：李代總統於最低度孫科與陳誠今次行動，已經說明了目前政府內部已開始意見分歧，正如已經到

用其武力做著大規模的走私買賣，經常襲擊海關分卡，及破壞廣九鐵路交通。恩平，開平，新會，台山，陽春，陽江等縣，林興華，敖仁等部二千餘人，常遠攻縣城，與南路之鄭坤廖部互相呼應，成時角之勢。

從上述的數字中，可以看到在廣東全省面積二一七，四〇四平方公里內，九個行政區，十個清剿區，一百餘個縣市中，東，西，南，北，中各區域已有三份之二以上縣份潛有共軍勢力存在，余漢謀是以「福策」稱時，有「福將」之稱，薛岳是以「打硬仗出名，有「鐵軍」之號，連兩張「王牌」現在都握在手中，正欲聽候大局的決定來「攤開」。(元月卅一日)

在短程的半個月來，廣州就一連有六七個與時局有密切關係的盛會，從級署主任余漢謀就職典禮起，跟着有省主席薛岳就職典禮，廣東各界歡迎余漢謀，薛岳，張發奎三長官蒞任大會，薛岳首次出席省參議會及記者招待會，及至最近孫科所召開擬建立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民黨中央委員，暨軍政軍政首長座談會，國民黨中接待會，一串串的「偉論」與報告五花八門，真是使那些為經濟頭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廣州小市民為之眼花撩亂，踴躍聞的記者們為之走癡了頭子。

國家，並強調以加強經濟軍事力量，來致力於中興革命思想的，使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成為復興根據地的廣東之決心。他又提出了一大堆好聽的施政原則：一日政治自由，二日經濟民主，三日軍事自衛，施政綱領及其目的：甲六大政綱，一日生民之政，二日養民之政，三日救民之政，四日衛民之政，五日管民之政，六日利民之政，七曰大目的：一日養民，二曰便民，三曰足民。

孫科於到穗後第二日(二月六日)，召集了一個批種各立憲黨座談會。他以有禮貌的動容，敦促記者們離開，復分將會堂四週十六面玻璃窗及紗窗關閉後，振臂高呼說：「……接受共黨給出之八項和平條件，等於投降，此種和平保無可能，我們應該認此際能戰始能和平，政府此次南遷係有極大決心，和平宣告絕望，總統將仍統率海陸空大軍對共產黨繼續作戰，依照目前形勢，後方仍有大部份民衆，仍有許多地方，只要大家團結能拒作仍有可為」……我們暫時應京，就是準備不投降，南京固然是可能成爲北平第二，但是我們必要打下去，爲的是毛澤東的條件太苛，必要使人不能接受」。跟着吳鐵城也起立先說了與孫科同一套「投降和平要不得」的話後。更以兼外交部長的資格，報告當前的外交形勢他說：「如果我們不投降降式的和平，我們仍將獲得援助，美國仍將以撥款方法來援助，目前我們盼望獲

張發奎在目前雖仍未赴海南到任，但在穗分頭積極向當局要「錢」要「兵」，他準備要把日產對四百萬，每噸價值美金七元的田馬鐵礦，收歸海南自有，作開發建設，建軍之經費，他又要求把軍中六十四年廣東子弟兵，由其他弟張顯誠任副軍長，調駐海南，並將原駐海南的一三三旅正式改編爲一五九師，再把宋子文自購的六架小型直昇飛機交海南使用，並由陳策出任海軍第四區司令，兼級署副主任駐部海南。

得五萬英元事振動，二德至三德美元農村振動，三德美元穩定幣值振動，其後他更以愉快的口吻說：「照目前形勢而論，美國絕對不能坐視共產黨統治中國，使太平洋安全受威脅，而將採取行動。」
從余，薛，張三位二德上將，担起百

沉悶中的刺激

(南京通訊)

「和平被百」已經發出了，「和平條件」也已「選擇了」正面的答覆；但是，備戰謀和的「忠誠」，若擇得好的「敵軍」，使這個人想望的和平，一波三折，變幻莫定。從從裏看，今日當輪之望和心理，并不下於一般人，但他們心目中的和平，是所謂「光榮的和平」。只有「光榮的和平」，才曉得他們的既得利益；「光榮和平」無法獲致，就似乎不如索性來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計，硬碰到底，「不幸」的是今天不同於三年前以前，歷史不會重演，所以「主和也難，對象不合，主戰也難，條件均差」(「展望」二期)的主觀，確乎淹沒了一些致意退還的人物。然而和平之聲一出，則馬蹄進，和平的騾馬漸難具體後，對「和平」大造其業者，遂不好一切，進行南遷，意思是和平也好，戰也好，設開砲火射擊之內的部門，總可以在這和戰之間，拖廷一時。

緊急疏散令下了，緊急疏散的喜十二月底，文武機關都捲入緊急疏散的狂潮裏，變籍，變色，各色人等忙無一時。他們同樣的做着往來的工作，彼此却有迥然不同的心情，有的，在做着「三後」(接收)的美夢，寄希望於「二三年後」；有的，為了生計問題，不能免於真空時期飢饉的恐懼，而無可奈何的迎接流徙；有的，平素積蓄了幾個大頭，不願再走那希望渺茫的孩子，而決定「留守」南京了。就在這一去一留之間，應變，疏散，這散

粵軍政大旗，到孫吳二巨頭來棧，廣州一直是孫吳兩派，殺氣直衝斗牛之間，一切都為了維護這個垂亡的政權而戰，這個政府統治中國的歷史，是從廣州由頭寫起，是否亦將以「廣州」二字為這部歷史結尾？這雖然還要等待事實來說明，但今日每

費……等等名目，加強了印刷金圓券的工作效率，也誘使了政府權要，當在南京最後一刻還表現了不少貪污腐敗的醜態。各首長「揚款消渴」的新聞，幾乎成了春節前幾天各報的必備之一格，對政府尚存一線好感的有心人，到這時也不能不在哀婉歎息，整整雙眉中，改變了他們一向的天真。

揚款消渴的第一砲，當推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現任中央大學校長周鴻經，是堂堂的數理博士，所謂「學者專家」之流，對於「逮捕匪諜」「不無微功」的教育行政家，據說在元月底還了同學進餐，伙食費七千餘元便不告而走了，不辭而別了！消息傳出後，周又憤然返京，并在各報「函請更正」，大發啓事，說他之出走是「乘校中假期之便來滬料理家事」，而根據「周校長最高學府為人師表平日清苦自甘何至此無恥之行」否認揚款消渴的消息，現在中大救查還沒有結果，而「捉拿周校長，我們要飯吃」的口號，卻已響徹石頭城中，本黨姑妄記事件的源末。除此之外，代理國史館長但懋辛，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白雲梯，工商部長劉振綱，也都各有同樣的作風，劉據說是在機務失風致被追尋職員「扭獲押回」，但他們都還沒有登啓事否認「無恥之行」。一家曉得調皮的說：「可憐國史館長的史料，無法一頁付國史」了，豈不可惜！可謂

一個廣州人，都不曾僅僅像一九二六年，以一省之力支持北伐成功的光榮歷史重演！而只是用一種沉重憂鬱的心情，來「迎接」道「戰鬥的明天」！
(二月十日)

邵竹軒

譚而又成。財政部總務司長為了職員疏散費問題，被「同仁」包圍，地政部一次長，也曾被員工圍毆，政大總務長為了和發工友道義結「架」，「越鬧越鬧」未來，跌傷腿骨，而呻吟在中央醫院病榻上。新上任的剛理，也有不超職工友的地方，想了多年的，剛到手的內長洪蘭友，留下五萬元便瀆之大吉。最高當局「你們還要好好的幹」言猶在耳，偉大的，劃時代的「轉運」竟做得到如此狼狽，恐怕不單是小市民們意想不到，最高當局如果聞悉，也將要「出乎意料」的「極爲震怒」吧。

「能戰始能和」的格言，朝步不斷的響在達官貴人們口邊，但是，只這一次「轉運」的影響，尚使還有戰鬥力量，這戰鬥力量不知又被削減了多少！一個個「領袖輩倫」人物的作風，顯然對那「決有把握」的前途，喪失了信心，棄械，捲款，都是「退隱山林」終志其鄉「計劃」的第一步。廣州將來如何要實施，不得而知，但各地紛紛用銀元，幣制的紊亂則已露露其端倪了！
疏散列車從下關源源開出，車站又恢復了徐蚌會戰時的一虛現，一般情況和平呼籲，這次「疏散」說不定可以得免。隨着滿腔恨關走了，離開了已受戰事威脅的南京人少了，兩浦的緊張却使疏散帶給南京的混亂無法復原，位在下面的打蘇

郵政局遷到新街口。鼓樓以北的居民也紛紛準備「南遷」。硝煙氣味彷彿已可微覺準備一點了。
稀疏的爆竹聲，有意無意的點綴了婦人的春節，緊急疏散總算在倉促條件中「功德圓滿」，靜慮來到南京，車馬叩接，黃塵滾滾的轎車行列不再見了，新式包車都已轉移到新陣地去臨聘。一切顯得那麼冷落，連運糧已開出，但各商家仍抱着觀望態度，遲遲復業，由于購買力的低下，商業繁榮，市況不振，莫怪外籍記者要報導「南京已成喪屍風味的都市」了。

幾個大學教授組織而成的「人民和平代表團」並沒有引起人民多大的興趣，他們的活動也是偏狹得很，連他們都在一個行列裏的到不同，余請一等教授，都談不來；却是所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琛代表王一東的行動，倒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固然，給人以此神祕之感，是其原因之一，但我們與其說一般對王一東感興與趣，毋寧說是他們對王局部和平深具期望。全面和平的困難重重，八年抗戰三年內戰打得疲憊已極的人們，成功於然的渴盼一個局部的和平，很自然給他們以天大的興奮，却不知道今日部門究竟是誰家的天下！局部和平幻滅之後，南行開朗的心情，又恢復了昔日的沉重，這沉重，像十多天來項在人們頭上的形雲一般，融解不開了。中大，政大兩個學府，慢慢走上了正軌，留校的教授學生們正積極策劃復課，座座兩車，我從難校教授，同學早返京。金大，女大兩校困難就多了，學生早已隨着「長」字號家長「一去不返」的南下了，學生寥寥，經費大成問題，市立中小學決定廿一號上課了，學費依照米價折算，小學五斗，初中一石五斗，高中二石五斗，學校里的駐軍，衛戍部雖已允許設法，能否做到，還有待事實表現。
「祥和措施」逐步兌現中，這裏却先後有一家報館被查封，一家報館被停刊

